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中国辞赋研究

龚克昌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辞赋研究/龚克昌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11-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ISBN 7-5607-2681-X

I. 中...

II. 龚...

III. 赋—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3095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 插页 30.5 印张 793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此书的雏形是《汉四大赋家初探》。那是我1962年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当时颇受好评，被安排到校一级作答辩试验——因为我们是国家首届三年制研究生，全国只有几所知名大学试招，山大文理科只招九人，我校是首次进行论文答辩。答辩后，根据诸先生的意见，我利用暑假时间，进行了补充修改，字数由八万增至十四万，并根据导师陆侃如先生的建议，寄给出版社。出版社以为此题为学术界所未曾涉猎，故很感兴趣，把它列入出版计划。惜随后阶级斗争又被强调起来，此书稿自然无法出版。“文革”中，书稿被迫焚毁。“四人帮”垮台后，我又重操旧业，于1981年开始发表赋论，并于三年后结集出版，改名《汉赋研究》，计十六万字。此书被认为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汉赋的专著”，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也以为“本书是分析汉赋主要作家最精辟最有启发性的一本著作”，并建议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我赴美讲学。我因而于1988年到美国哈佛等五所名校讲学。随后康教授又将我的讲稿译成英文在美出版。

根据与康达维教授的合作协议，我于1990年在济南主办首届国际赋学会。会前我把在此之前所写的赋论再次结集出版，包括其中有一篇论文于1988年被评为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当时论文最高奖），仍沿用旧名《汉赋研究》，但字数已增至三十六万。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更大的反响，前后有十几家

报刊加以报道。权威的《辞赋大辞典》认为：此书“研究课题的系统性，理论问题的重大性，文献资料的丰富性，学术观点的新颖性、系统性，共同构成此书的学术亮色。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汉赋研究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因为它而带动了我国当代学术界对汉赋的真正有意义有声势的研究，在学术界具有首开风气的作用和影响。本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欢迎”。

在首届国际赋学会上，我建议与会同仁多多关注魏晋以后辞赋的研究，自己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写了一系列文章。现在，我把几十年来所写的主要赋论编辑成册，承蒙山大出版社总编的建议，取名《中国辞赋研究》。这个书名实在太太太重，我殊感承担不起。今后我自当继续努力，尽可能再补写一些篇章。

我在撰写《汉四大赋家初探》时，陆师曾要求我先把四大赋家所有赋作逐篇注释一遍，逐篇写出阅读心得，再读相关的文学、政治、历史背景材料，然后才考虑写论文。这一操作过程遂变为我自此之后撰写论文的成规。近读老学者任继愈先生的一篇发言稿，他对自己的学生竟也作如是要求：“当年我带研究生时，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读不懂原著不能写文章。”他不满意现在“有些青年学者”，“不读书而喜欢写书”，“从网上下载，连缀成篇”，“一年之内写它三五本书毫不吃力”。我以为陆师与任老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是不错的——我对我的博士生也作如是要求。我在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全是从逐篇注释阅读中获得的。尤其是其中的“辨析”部分，都记录了我发现的新问题。所以我把几十年来的读赋心得附于书后，可能不无意义。

这次结集出版，凡已发表过的篇章，除对部分内容有所修订增补外，其余一仍其旧。

山大出版社慷慨拨巨资出版拙作，并表示以最高规格出版，使我既感激又惭愧。我只能说声谢谢！

龚克昌

2003年4月

目 录

序.....	(1)
论汉赋.....	(1)
汉赋三论	(27)
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48)
关于汉赋之我见	(75)
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	(88)
汉赋——韵文史上的奇葩.....	(104)
关于汉赋的铺张扬厉.....	(122)
评汉代的两种辞赋观.....	(130)
汉赋文学精神长编.....	(142)
汉赋探源.....	(199)
论两汉辞赋与书法.....	(216)
诗赋讽谏散论.....	(234)
刘勰论汉赋.....	(247)
古典文学艺术美发展的艰难历程	
——从汉赋、六朝诗文、宋词谈起	(266)
骚赋作家贾谊.....	(288)
读《鹏鸟赋》	(300)

散赋作家枚乘·····	(304)
庄忌与他的《哀时命》·····	(315)
刘安君臣的《招隐士》与《屏风赋》·····	(321)
孔臧其人及其赋·····	(328)
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	(332)
司马相如评传·····	(354)
《长门赋》简说·····	(416)
汉武帝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420)
东方朔评传·····	(434)
扬雄赋论·····	(448)
班固赋论·····	(475)
张衡赋论·····	(499)
赋风转变的名篇——《归田赋》·····	(530)
抒情小赋作家赵壹·····	(533)
《刺世疾邪赋》简论·····	(550)
谈《刺世疾邪赋》中的诗·····	(559)
蔡邕评传·····	(564)
文变染乎世情	
——谈魏晋南北朝赋风的转变·····	(592)
竹林七贤及其他·····	(603)
魏晋玄学与“竹林七贤”赋作·····	(620)
竹林名士心态之写照	
——读刘伶《酒德颂》·····	(639)
读《中国历代赋选·魏晋南北朝卷》所想到的·····	(641)
赋学研究与六朝赋述论·····	(646)
体物·浏亮	
——读陆机《白云赋》·····	(652)

绝妙的讽刺

- 读鲁褒《钱神论》 (655)

熔山水仙佛于一炉

- 孙绰《游天台山赋》解读 (658)

安适·恬静

- 谈沈约《郊居赋》 (661)

写景三题

- 江淹《赤虹赋》、《江上云山赋》、《莲花赋》析 (663)

山水散文赋的杰作

- 读吴均《与朱元思书》 (669)

读萧子范《建安城门赋》 (673)

略论韩愈辞赋 (676)

读晏殊《飞白书赋》

- 兼论飞白书法 (689)

李清照《打马赋》简论 (697)

天山的颂歌

- 谈王大枢《天山赋》 (704)

读《香港赋》、《三峡赋》 (708)

中国古代赋体研究简论 (713)

《楚辞选注》序 (723)

《屈原赋译注》序 (727)

《汉赋新选》序 (730)

《汉赋美学》序 (751)

《隋及初唐赋风研究》序 (754)

《颜其麟赋鉴赏集》序 (760)

海内存知己

- 忆与美国著名辞赋研究家康达维教授的交往（代序） ... (764)

心有灵犀一点通

- 忆与台湾著名辞赋研究家简宗梧教授的一段交往 …… (776)
- 我研究汉赋的前前后后 …… (783)
- 赴美讲学回国补记 …… (790)
- 附录：读赋心得 …… (795)

论 汉 赋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汉赋的评论分歧是很大的。毁之者如西汉的扬雄，视汉赋如同“童子雕虫篆刻”，因而誓曰：“壮夫不为”（《法言·吾子》）。誉之者如南朝的沈约则说：“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宋书·谢灵运传论》）但对汉赋最推崇的莫如近代学者王国维，他视汉赋为汉代四百年文坛的总代表，并把它放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驾齐驱的地位。解放以后，人们对汉赋的看法似乎发生了一边倒的变化，这就是大家对它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那么上述诸观点孰是孰非？抑或应如何评价才较恰切允当？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谈一下个人意见。

—

汉赋的最大特点是几乎篇篇都在反对帝王的骄奢淫逸。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天子帝王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无尽的财富，他们的生活往往是极其奢华的。而他们生活上的放荡又往往与人们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墨子说过，“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台榭”、“为美食”，“必厚作敛于百姓”。最高统治者肆无忌惮地追求声色口腹之欲，势必加重人民的负担，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从而动摇封建王朝的根基。所以统治阶级中比较有远见的

政治家、思想家，总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历史上荒淫奢侈的昏君，而竭诚赞美以俭约自持的明主，用以讽喻当今，昭示来世。如沉湎于酒色、荒淫无道的周厉王、周幽王，早就成为众矢之的；而传说中的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粢粢之食，藜藿之羹的尧帝，则受到人们的赞扬。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也正是这样。《诗经·小雅》中的《正月》、《雨无正》，《大雅》中的《瞻卬》、《抑》，都是讽刺最高统治者的荒淫误国。民歌《齐风》中的《南山》、《敝笱》、《载驱》，《邶风》中的《新台》，也是揭露最高统治者生活上的丑事。由此可见，在批判最高统治者淫奢这一点上，劳动人民、文人以及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观点是有共同之处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利害也有相联一面的缘故。汉赋正是继承了先秦文学这个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而加以发展的。

尤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最高统治者的侈靡，在汉代具有其更加迫切的意义。汉初，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给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三辅黄图》记载，仅汉武帝一代，就筑有数不尽的宫阙苑囿台榭观阁。汉武帝想吃南方的鲜荔枝，就筑扶荔宫，“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武帝为求仙寻乐，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满三十者，出嫁之。……时有死出者，随补之”。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骑万乘。……苑中养百兽……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所以《三辅黄图》编者愤慨地指出：“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鍤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邪心以夸天下也。”汉武帝的奢华靡费，是过去任何帝王都不能比拟的，连暴秦也不在话下。

针对这种情况，汉赋把反对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作为自己

创作的主体——几乎所有赋家都围绕这个主题——大作文章，是有现实意义的。他们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对当今皇上进行委婉的劝说和谏诤；有时甚至大胆地、赤裸裸地进行揭露和批评。班固在为司马相如赋辩解时说过：“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汉书·司马相如传》）班固这里虽仅提司马相如一人，但他实际上是在辨明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为相如以后很多赋家都仿效他的笔法——“虚辞滥说”和“引之于节俭”。所以班固对相如的评价，我们可以看作是对整个汉赋的评价。汉大赋的确是几乎篇篇在“讽谏”统治阶级的淫奢，而指归“引之于节俭”的。下面我们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来加以论证。

先说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者。他的赋作标志着汉赋体裁的基本定型。他的赋影响了两汉整个赋坛，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相如共有赋二十九篇。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可靠的只有《天子游猎赋》（《文选》分为《子虚》、《上林》两篇，误）、《大人赋》、《哀二世赋》。在这三篇中，《天子游猎赋》最负盛名，我们着重分析这篇。

《天子游猎赋》惩奢劝俭的主题是很清楚的。在这篇赋中，作者先安排诸侯王的代表——楚王的子虚和齐王的乌有先生——在那里为其主子争奇斗胜，实则在于自我暴露。乌有先生以齐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列卒满泽，罟网弥山”的盛况向子虚炫耀；子虚则拿楚王的“云梦之事”的派头来相压。最后作者让天子的代表亡是公出场，把齐、楚之事统统加以批判：“亡是公听（读‘晒’）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且二君之论……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这里，作者虽含有对诸侯王身份的贬抑，但我们从亡是公所批判的内容，不是正可以看出作者对此事的态度吗？！“从此观之，齐楚

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仆恐百姓被其尤也。”作者把诸侯王的淫乐与老百姓的苦难紧紧联系在一起。

对天子，不便由外人来加以指摘，作者采用了让天子在淫乐之后反躬自问的手法：“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指苑中土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贍萌隶；隄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疲车马之用，抗（音“玩”，损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由）也。’”天子自感有失，赶紧决定推墙填堑，让百姓得以种地樵薪。作者采用这种手法批评天子的过失，其用心亦良苦矣。

相如在《哀二世赋》里，也借用秦二世的荒淫残暴而招致杀身亡国之祸来提醒武帝。在他种文体——《谏猎疏》中，相如也曾警告武帝，如果一味地田猎嬉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胡越起于毂下，而夷狄接轸也，岂不殆哉！”见出相如反对帝王的淫奢是一贯的。

扬雄是继相如之后的又一位大赋家。他的赋现存有十篇（包括《反离骚》、《解嘲》和残篇《酒赋》）。他的赋“讽谏”的气味更为突出。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十二月，他随汉成帝去打猎，便立即上《羽猎赋》来讽谏成帝，提出帝王的饮食起居游乐礼仪都应有节度，绝不能影响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作者还批评成帝的老祖宗汉武帝：“武帝广开上林……游观侈靡，穷妙极丽……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尚泰奢丽夸诩。”武帝实在太奢侈了。他要成帝吸取这个教训，关心农民生活与生产：“丞（拯）民乎农桑，劝之以弗怠……恐贫穷者，不遍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

在《长杨赋》里，扬雄甚至直接指责当今皇上——汉成帝。作者在序里明明白白地说，他对当今皇上为向胡人显示自己的派头，不顾农民死活，逼他们入山捕捉各种野兽十分不满，因此“上《长杨赋》……以讽”。在赋中，作者写道：“今年猎长杨……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岂为民乎哉？”在最高统治者无限制的纵乐与农民的受害之间，扬雄是坚决站在护卫农民这一边。他为百姓争利的态度是相当执著的。

和扬雄比较起来，班固的赋要稍逊一筹。班固是东汉初期重要赋家。他的赋有《两都赋》（分为《东都赋》、《西都赋》，实际是一篇）、《幽通赋》两个整篇和另外五个残篇。其中《两都赋》最负盛名。在这篇赋中，作者强调的是法度，他一面赞扬东都天子举止的合度，一面批判西都天子行为的逾制。和西都天子比起来，东都天子已属俭约；可是作者还不肯就此罢休，他还要天子“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

作为一个封建制度的竭诚拥护者，“典型正宗人物”班固，他拿“法度”作武器来臧否人物，来约束最高统治者过分的奢华，是很自然的。我们一方面要看出他批评的局限性，但他反对最高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还是不应全盘否定的。

继班固之后，是东汉中期杰出赋家张衡。张衡保留下来的赋作较多，有七个完整的篇章和五个片段。其中《二京赋》和《归田赋》最为著名。前者创两汉长篇的极轨，后者开后代抒情小赋的先河。

在《二京赋》里，作者对西京的宫室建筑和西京天子在游猎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毫无节制的骄奢淫逸作了尽情的揭露和鞭挞，并把它与人民的苦难和封建王朝的安危联系在一起。作者借安处先生批判凭虚公子说：“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殫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

舟。”统治者如果只知一味地穷奢极欲，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他们就可能揭竿而起，把你推翻。他在赋中还说，如果为君的“必以肆奢为贤”，那么桀纣都做对了，汤武还革什么命？秦始皇筑阿房，起甘泉，“征税尽，人力殫”，弄得“百姓不能忍”，因此才“息肩于大汉”。这里作者的是非好恶态度是极其明确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张衡赋中所指控的最高统治者的骄奢，虽多征引史事，但他的两眼却是逼视着现实生活的。正如《后汉书》本传所说的他写《二京赋》的动机那样：“永元（汉和帝年号，公元89~105年）中，（衡）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因以风谏。”“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云云，我们可以从他同时代人王符所写的《潜夫论·浮侈》中窥见一斑：“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这种社会风尚，自然是最高统治者诱导的结果，上行下效，历世皆然。所以作者虽没说“王侯”以上的如何“逾侈”，我们仍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张衡赋乃是针对最高统治者的淫奢而发的。

最后我们来谈谈枚乘的《七发》。

《七发》是一篇反对淫逸无度的佳作。赋中，作者描写了楚太子由于“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以致“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个说法至今仍属确论，这是实践的结晶，是科学的总结。作者认为，患这种疾病是无药可医的，“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唯一的办法是抛却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加强思想修养，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如作品所表现的那样，楚太子听了“要言妙道”，便“据几而起”，“泅然汗出，霍然病已”！这篇赋至今仍有

强烈的现实意义。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

第一，汉大赋的确是第一次集中地把作品的主题放在反对天子帝王的骄奢淫逸上。过去《诗经》虽也已接触到这个问题，但篇幅很少，在三百来篇中只占个零头；《楚辞》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它主要是批判最高统治者政治上的昏庸。汉赋这样做，应视为文艺作品描写内容上的有效扩大和提高。这是应该肯定的。汉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现实生活的要求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是作者认识提高的结果。

班固在批评扬雄时说过：“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班固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文学艺术能不能运用夸张手法的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人是持否定意见的。扬雄、张衡、王充都是这样。他们极力反对“靡丽”和“虚辞滥说”。左思在《三都赋序》里批评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赋说：“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而他自己呢？他是严格遵守真实的：“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他是坚决反对夸张虚构的。刘勰也是持这种观点。他在《夸饰》、《诠赋》、《辨骚》等篇中都表示过这种意见。这实际上是表现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特征还没有充分认识的缘故，我们不能以为是正确的。其二是所谓“劝百风一”或“卒章见志”的问题。这实际上仍表现当时人们对文学艺术缺乏全面的理解。他们以为赋作应通篇都在“风”，到处都“见志”。这主要恐怕也是儒家的思想在作怪。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是用形象来说话的，它与政治论文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文艺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允许含蓄隐蔽，允许卒章见志的。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就表示过这个意见。只是汉赋做得过分一些。但作为文学

艺术发展的初期、早期阶段来说，存在这个缺点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甚至应该把它视为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有益探讨。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汉大赋作者大都生活在最高统治者身边，他们写赋是要给最高统治者看的，而且又是批评其行为的过失。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说话自然得十分小心谨慎、含蓄隐蔽。尤其是，对于像汉武帝那种“性严急，不贷小过，刑杀法令，殊为峻刻”的帝王，是不能随便训斥的。这与那些在背后进行创作或民间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骂皇帝是不同的，我们应加以区别。当然我们也不为其弱点辩护。这是第二点。

至于扬雄所说的，写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和枚皋所说的“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汉书·枚乘传》）云云，这实际上是扬雄、枚皋等看不起辞赋，也即看不起文艺创作活动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唯有阐发经典著作才有意义，唯有从事经国大业才有前途。蔡邕在他的《封事》、中以及后来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都有类似的观点，所谓“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这种看法其实是很片面的。这是第三点。

对这个问题，我将作进一步考虑。

二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有认识生活的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可见他也懂得文学作品在教育作用、讽刺作用之外，还有个认识生活的作用。但由于《诗经》多是抒情小诗，《楚辞》也主要是抒情诗，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往往属于思想感情上的东西，不够具体。汉赋却不然，它主要是描写的、叙事的。这也就是说，作者已开始注意大量地观察描写周围的事